

B 白城记忆

阎宝航在辽北(下)

●宋德辉

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,阎宝航任务极其繁重,但他仍十分重视教育工作,关心教职员素质的提高,为使教职员能适应解放后新的教育制度,还对教育行政干部进行短期培训。从1947年7月到1948年10月,阎宝航先后3次主持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,每一次都要发表讲话。在1947年7月12日召开的辽北省教育工作者大会上,他阐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,重申了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。他指出,东北青年存在的正统观念,正好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。教育工作者对业务要求从形式和内容上来一个彻底的改革,配合实际进行教育革新。他号召大家追求真理,担负起教育培育第二代主人翁的伟大使命。9月1日,他在大会闭幕会上勉励大家说:“你们回去以后,要和人民打成一片,参加土地改革,要在培养革命干部,把学校办成推广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中作出贡献。”

1948年5月7日,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辽北省分会成立,由省政府主席阎宝航任主任,教育厅厅长林海任副主任委员,并发出通知,指出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辽北省分会是辽北省文物保管领导机关。在辽北工作期间,阎宝航不但兼任辽北省民主学院院长,还在1948年5月12日主持创建了辽北学院,并任该校校长,以适应新形势,培养建设新辽北的文教、政权、农业等各方面人才。他多次到学院授课,为解放区的建设与发展培养了一批干部。

1947年春,东北民主联军处在战略大反攻的前夜,由于国

民党军队的封锁,辽北地区非常艰苦,阎宝航与干部、群众同甘共苦。为了支援前线,辽北省政府带领直属机关干部开展生产节约运动。他以身作则,带头执行,从此戒除了几十年的吸烟习惯。他和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一起,把白城子所有空地都种上了庄稼。同时,他下乡视察自带高粱米,在区政府做饭,不接受任何招待。夫人高素虽年近花甲,也和另外两位女同志种了五分菜地,并计划纺织。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,省政府干部、群众及各团体积极行动起来,纷纷参加生产节约活动。1948年2月17日,阎宝航签发了省政府《关于大量开展机关生产的指示》,号召每个机关干部生产粮食两石(每石五公斤),完成粮食全年自给任务。

1947年夏,在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期间,阎宝航率省政府慰问团、四专署文工团以及省立一中学生,带大批慰问品、慰问信,前往四平攻坚战外围的八面城、郑家屯等地进行10多天的慰问。1948年9月,阎宝航领导下的辽北省屯动员支前民工达20万人。

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,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任务都是围绕战争进行的,领导和机关作风、思想和精神都是以是否适合战争需要为标准,要求是严格的,标准也很高。1947年2月初,到辽北省就职后,阎宝航严格要求自己,以旺盛的革命斗志领导辽北人民支援东北解放战争。但是,随着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,给各级政府的任务愈来愈繁重,要求也愈来愈高。为适应战争

天人合一话古琴

●朱秀坤

琴棋书画,乃古代文人必修之“四艺”,第一便是古琴,可见古琴地位之高。连孔圣人还要向师襄子认真学琴呢。林黛玉幼时学抚琴,够不着长度为三尺六寸五分(暗合一年365天)的琴,其父林如海还专门为她订制过一张短琴。

作为最古老的弹拨乐器,古琴历来为文人士子所器重,并以抚琴来陶冶情操,涵养心灵。净手焚香,整衣肃容,淡泊从容地弹,气定神闲地弹,心无旁骛地弹。古琴弹出的是一种高雅志趣,一种思想境界,一种人格写照。抚琴者并不单纯是为了倾诉,更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种心灵的独白,是天地之间的思想徘徊与吟哦感叹。所以,古琴从不用来重奏或齐奏,只宜于清风明月下、竹林松涛间,或石崖水畔、静室高斋进行弹奏,讲究的是与自然的和谐,天人合一乃弹琴的最高境界。若有知音当然好,遇不上知音,宁可弹给山海流泉听,弹给星光月色听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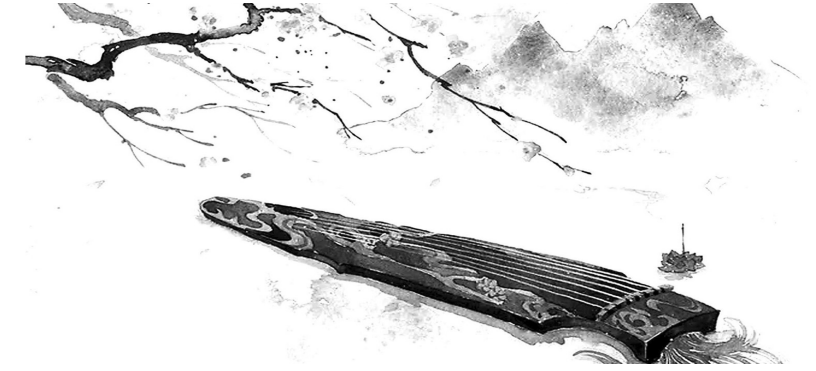
弹给草木鸟兽听,弹给宇宙自然听,更多的则是弹给内心,弹给我听……

古琴的音色相比于其他弹拨乐器,稍有些低暗、沉闷,也不宜在大庭广众之下弹奏。古琴本质上是一介“隐士”,性情是内向的,表达的情感是深沉的,属于思想型的乐器,一贯离群索居,含蓄内敛。

静下心来聆听听古琴曲《流水》,不断跳跃的移指在弦上抚出一串串泛音,加之反复的轮指,真的可见大江流水铮铮淅淅,清清冷冷,峭壁间犹有云雾萦绕,缥缈恍惚,让人犹在仙境。后来大幅度的滑音,弹出跌宕起伏的旋律,连续的,猛滚、慢拂,竟似听到了惊涛骇浪在怒

吼,极具沸腾澎湃之意象,好像已在急流险滩,一个巨浪袭来,顷刻间即可人仰马翻,全军覆没。真的难以相信,区区七根丝弦竟能弹奏出如此大气磅礴的气象来。就在你牵扯着一颗心担惊受怕时,音调先降后升,气势渐弱,一阵叮叮咚咚舒缓的旋律告诉你,轻舟已过万重山,空留余浪击石,一片清波而已。难怪钟子期听了俞伯牙的这段曲子说:善哉乎鼓琴,汤汤乎若流水。

据明代《神奇秘谱》记载,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二曲本只一曲,至唐分为两曲,不分段数,后来分《高山》为四段,《流水》为八段。两千多年来,《高山》《流水》两首著名的古琴曲与俞伯牙摔琴



谢知音的故事一起,被广泛流传。

《潇湘水云》又是一段古琴名曲,娴熟地运用古琴特有的吟、揉等手法,又巧妙地组合了按音、泛音、散音,在你眼前铺展开天光云影、江汉舒清、万里澄波、浪卷云飞、水云奔腾、寒江月冷等景象,集中体现了古琴艺术清、微、淡、远的含蓄之美,心旷神怡之际,顿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之情。

古琴虽说有些“孤僻”,在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中却极为难得地与箫合奏了一回。更为难得的是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,主题曲《枉凝眉》一开始就是古琴在弹奏,一种雅致、古朴的韵味马上弥漫开来,直让人疑为天籁。

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琴,因其内涵丰富、影响深远而为世人所珍惜,已成为传统文化的瑰宝。

15个亿,是个什么概念?想当年风靡全球的《阿凡达》在国内上映,这部巨幕影院前排队一公里的现象级商业大片花了两个月也不过13亿票房。而今年国庆三大影片之一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只用5天就达到了15亿。

截至10月7日24时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票房已超22亿,紧随其后的《中国机长》19亿,《攀登者》近8亿。不仅是这三大兼具商业大片属性的主旋律影片,节前先行上映的《决战时刻》票房也已破亿。

不能不说,这批电影,给力!国庆主旋律电影票房此番创下的佳绩,足以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这个国庆,火爆的不仅是票房,还有口碑。在豆瓣的最新评分中,《我和我的祖国》拿到了8.0分(满分10分),《中国机长》和《攀登者》分别达到7.0分和6.7分——真实事件改编、注重细节、走心、接地气,让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和正能量……这些都是他们成功的秘诀。

比如《中国机长》,影片改编自一年前发生的川航3U8633航班空中突发故障的真实事件,真实还原了事件发生过程,甚至精确到机长在故障发生时与空管的对话一字不差的程度。同样还有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的首个故事《前夜》,改编自工程师林治远在开国大典前反复试验电动旗杆的真实事件,黄渤的精彩演绎让观众不得不和他一起紧张和感动。

而除了今年火爆的国庆档大片们,不久前的《烈火英雄》也收获了相当出色的票房和口碑,新时代消防员的真实群像感动了一拨又一拨不同年龄的观众;同期的《古田军号》也借鉴了偶像剧的手法让年轻、高大的毛泽东形象鲜活地出现在大银幕……

真实贴近观众,细节决定成败。电影想要赢得市场,就要搞明白观众真正喜欢的是是什么,不喜欢的是是什么,怎样的剧本才能真正走进观众的心里。

今天的观众,口味早已在逐渐成熟的电影市场中不断丰富,人们需要从电影上看到时代的发展、历史的细节,看到新的面孔、新的故事和新的感动,需要看到在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浪潮中中国电影人的努力。

我看我说

这批主旋律电影,给力

●张东伟



范仲淹念书时 每月有多少生活费?

及各府管辖的府学、各州管辖的州学、各县管辖的县学。

跟现在比,宋朝官学的规模很小。宋徽宗在位时,拼命扩大官学的规模,把全国二十四个省级行政区(当时叫做“路”)的府学、州学、县学统统加起来,再算上等级最高的太学,拥有学籍的学生总共才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人,而且这是宋朝官学的巅峰时期,此后全国官学的在籍学生数量始终在十万人以下。

我为什么强调“在籍学生数量”呢?因为宋朝官学里还有一大批学生是没有学籍的。没错,他们在太学、府学、州学、县学里读书,但是并没有被官府统计在册。因为没有被官府统计在册,所以他们享受不到官府的补贴,他们是真正的自费生,平均开支自然要比在籍学生多一些。

千古名臣范仲淹,当年曾是自费生

比如说,范仲淹年轻时就是一个自费生。

范仲淹两岁丧父,他母亲带他改嫁到一户姓朱的有钱人家。两岁大的孩子,当然没有记忆,他在朱家长大,在朱家的家塾里读书,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朱家的子孙。直到二十岁那年,他劝朱家的两个同辈兄弟不要铺张浪费,人家非但不听,还嘲笑他:“吾自用朱家钱,何预汝事?”(南宋楼钥《范文正公年谱》)俺们花的是俺朱家的钱,跟你这个外姓有啥关系?听闻此言,范仲淹大惊,开始调查自己的身世,才知道他不姓朱,而是姓范。

知道了身世以后,范仲淹不沾于寄人篱下,背上书箱离家出走。他母亲跑出来追他,他说:“母亲不要担心,儿子可以自立,等儿子金榜题名那天,再回来接您。”然后范仲淹单枪匹马来到当时的南京应天府,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,凭借优异成绩考进应天府的府学。那一年,他二十三岁。

范仲淹在商丘官学昼夜苦读,学到打瞌睡,就用冰冷的井水来提神。他脱离了朱家的供养,断绝了经济来源,所以衣食拮据,生活上十分节俭。根据宋人笔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,范仲淹自做自吃,一天只吃两顿饭:每天睡前熬一锅粥,第二天早上,粥会凝结,他切成四块,用布包起来,带到应天府学,上午吃两块,傍晚再吃两块。冷粥寡淡无味,他只能用咸菜疙瘩下饭,天天如此。

二十六岁那年,范仲淹得到应天府学的推荐,进京参加礼部考试,顺利通过;第二年又参加殿试,金榜题名;第三年参加“铨试”,也就是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,再次通过;二十九岁那年,他获得了做官的资格,被派到安徽亳州做官,将母亲接到了任上。后来范仲淹当上大官,用积攒的俸禄在祖籍苏州买下几千亩地,为苏州范氏家族创办了一所义学,让所有读入学的范家子弟都能免费入学。

范仲淹的故事非常励志,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当年他在应天府读书时,完全是自力更生解决伙食问题的。按照宋朝的教育制度,府学里的在籍学生除了学费全免,还能享受免费伙食,甚至还有“灯油钱”、“薪炭钱”之类的生活补贴。如果过日子节俭一些,不但不用花自己的钱,甚至还能把一部分补贴省下来寄给家里人。可是范仲淹呢?每天两顿饭,自做自吃,过着冷粥就咸菜的艰苦日子,为啥?因为他没有学籍,因为他是一个自费生,享受不到免费伙食,领不到生活补贴。

《宋史》里描写过官学里的自费生现象:“有司拘以定额,士游学校不被教养于学者,尚多有之。”有关部门受指标限制,学生数量一满,就不再给新来的学生注册学籍了,所以就有很多自费在官学就读的学生。

宋朝官学的学籍指标很少,还拿宋徽宗在位时举例,每个县只能有一所县学,每所县学的学生定额是三十人到五十人;每个府也只办一所府学,每所府学的学生定额是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。超过这些定额,只能自费。

那为什么不多办一些官学,多预留一些定额呢?原因很简单:办学需要花钱,养学生需要花钱,宋朝官府财力有限,能在全国范围内养十几万公办学校的学生,已经很不易了。

穷学生几百文能吃饱,富学生几万文不够花

现在我们来估算一下,范仲淹这个自费生在应天府学就读时能花多少生活费。前面说过,范仲淹每天只吃两顿冷粥,用咸菜疙瘩下饭。那时候,他二十岁挂零,正是能吃的时候,按照宋朝成年男子的正常饭量,每天大约要吃掉两升米,把咸菜算进去,总共相当于三升米。

北宋中叶正常年份,一升米售价三文钱,三升米就是九文钱,一个月三十天,吃饭这方面的开支总共不到三百文。拙著《君子爱财:古代名人的经济生活》考证过北宋中叶铜钱的综合购买力,一文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八毛,三百文就是两百多元。也就是说,如果不考虑其他开销的话,范仲淹每月生活费最多两三百元就够了。

当然,范仲淹除了吃饭,还要穿衣、看病、购买纸笔。这些开支过于琐碎,很难统计,不过我们可以间接推算。查宋神宗在位时建康(今南京市)府学的补贴标准,每名“上舍生”(在籍学生当中成绩最优异的)每月可以领到三百文的生活补贴,每名“内舍生”(在籍学生当中成绩中等的)每月可以领到两百文的生活补贴。如果范仲淹想按“内舍生”的标准去生活,只需要在每月两百多文的饮食开销之外再加上两百文钱,总共也就是四百多文而已,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块钱。

如果是家境富裕,生活奢侈的学生呢?那开销就大了去了。南宋中叶,一个名叫罗大经的学生进太学读书,发现一些太学生花钱大手大脚,嫌公共食堂的饭菜不好吃,自己花钱请厨子,偶尔还去外面酒楼聚餐:“亭榭帘幙,竞为靡丽,每一会饮,黄白错杂。”房间布置得非常豪华,宴席上用的都是金器银器。

南宋中叶通行纸币,通货膨胀现象严重,一顿上好的宴席就要花几百贯,也就是几十万文。按照综合购买力折成人民币,即使以一贯纸币只等于人民币十块钱估算,聚餐一次也要造牌几千块钱。

宋朝斥资兴办官学,是为了培养人才,不是为了培养只会花钱的废物,所以太学和府学里都有频繁的考试。每月一小考,每季一大考,每年一终考,以成绩划分等级,成绩好的学生成为“上舍生”,成绩差的学生成为“外舍生”,成绩中等的学生成为“内舍生”。上舍生和内舍生的补贴高,外舍生的补贴低,甚至不给补贴。

我们可以推想一下:范仲淹学习那么刻苦,考试成绩必定优异,他刚进应天府学时确实是自费生,可是他每次考试都得优等,府学领导也许会高看一眼,破例给他注册学籍,让他得以享受上舍生或者内舍生的生活补贴。

之所以这么推想,有两个理由:

第一,范仲淹在应天府学读了好几年书,如果没有生活补贴,每天都是两顿冷粥就咸菜,肠胃肯定受不了;

第二,范仲淹最后是被府学领导推荐到京师参加礼部考试的,如果他最后没有注册学籍,不太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话题:大学生一个月要花多少生活费,才算正常标准呢?有人说,至少两千;有人说,一千元足够了;还有人说,在消费比较高的一线城市读书,每月三千都得勒紧腰带。

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往前延伸一下,延伸到千年以前的宋朝,看看宋朝的学生一个月能花多少钱。

宋朝没有中学,上完小学就上大学

要想知道宋朝学生的生活费,首先必须搞清楚宋朝都有哪些学校,因为学校不一样,花钱的地方也不一样。

我们来给宋朝学校分分类。

按照就读年龄和教育程度划分,宋朝的学校可以分成小学和大学。在宋朝,正常标准是八岁入小学,十五岁入太学。小学主要学基础知识,例如认字,练字,学习《三字经》(成书于宋朝)、《百家姓》(成书于宋朝)、《千家诗》(成书于宋朝)、《千字文》(成书于南北朝)等启蒙读物,接触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,附带学一些诗词韵律和计算技能;到了大学,开始深入学习儒家经典。

有小学,有大学,那中学哪去了呢?对不起,宋朝没有中学。事实上,整个古代中国都没有中学,人们读完小学,就直接读大学。

因为没有中学,所以小学的就读时间就变得很长,少则五六年,多则十几年。因为小学就读时间长,所以宋朝的小学生年龄差别就很大。宋徽宗在位时,首都开封国立小学共有一千名學生,年龄最小的才六岁,年龄最大的竟然有三十三岁。为什么会有三十多岁的小学生呢?一是因为有的学生入学很晚,十几岁才上小学;二是因为有的学生程度太差,学十几年还不能学完基础知识;三是因为当时的小学生并不仅仅是小学生,还包括很多相当于中学生的“小学生”。

如果按照出资人来划分,宋朝学校又分为官学和私学。官学是政府办的,政府出资(也接受私人捐赠),非常正规,有严格的经费预算和指标限制,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;私学是民间办的,私人出资(某些私学会得到官府补贴),包括学界大佬和退休官员创办的书院,包括地方士绅创办的义学,包括有钱之家内部搞的家塾,也包括在城市和乡村里星星点点的私塾。

按照行政等级划分,官学还可以细分成直属于朝廷的太学、国子学、四门学,以